

鐵血精忠傳 (二)

戴笠史事彙編

喬家才

時代浪潮遠走廣東

民國十三年(一九二四)九月間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十月二十三日直系的馮玉祥，把軍隊撤離前線，悄悄返回北京，聯合胡景翼、孫岳發動北京政變，推翻直系賄選的曹錕北京政府，整垮煊赫一時的直系大將吳佩孚。國父孫中山先生發表宣言，主張召開國民會議，雖然身體已經不很健康，仍然北上共商國事。

十四年(一九二五)三月十二日國父病逝協和醫院，第二天黃埔軍校蔣校長統率的東征軍，以寡擊衆，棉湖大捷，擊潰革命叛徒陳炯明的主力，不久統一廣東。這時候澎湃的革命怒潮，瀾漫全國，各省青年紛紛參加國民革命，奔向黃埔。戴徵蘭的文溪同學周念行留日回國，到了廣東，姜超獄不再教書，也去了廣州，都參加了革命工作。

戴徵蘭早在民國三年就讀過國民黨的革命歷史，嚮往愛國志士，革命先烈的犧牲流血精神，決心離開保安，「走廣東」。他的愛妻毛秀叢拿出她僅餘的一點私房錢，交給他，再三叮嚀：「

我所有錢，都給你花光了，現在祇剩下這一點點，雖然不多，勉強可做路費，希望你這一次出去，多少要有點成就，不要再像過去一樣。」

戴徵蘭沒有告訴母親他要「走廣東」。辭別了愛妻，踏上征途。到達江山縣城，正準備搭船到杭州，在悅來客店碰到文溪同學毛人鳳。毛前一年去廣東，因父喪剛從廣東回來，告訴他廣東的真實情形，贊成他去投考黃埔軍校，送了他二十元路費。條條大道通羅馬，進黃埔是最正確的道路。

當時福建、浙江都在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控制之下，孫傳芳是標準的軍閥，反對革命，反對國民黨，被他捉住，格殺勿論。所以，「走廣東」的青年，必須秘密進行，不漏風聲，逃過孫傳芳的耳目。他經過杭州，沒有久留，趕緊到上海，乘輪船南下。他抵達廣州的時候，國民革命軍已經出師北伐，他唯一可以投靠的同學周念行也隨軍北上，離開廣州，失去支援。

廣州司後街有一家便宜的旅館「宏信學旅」，專門招待青年學生，每天房飯錢，不過三四角毫洋。戴徵蘭爲了省點錢，也落在這家旅館。

他攜帶的旅費本來就不充足，一個多月住下來，拖欠了旅館五元房飯錢，沒有按期交付。這家小客棧的老闆娘是位母老虎型的人物，非常兇悍。一天下午，戴徵蘭正準備上街，被老闆娘攔門截住，氣勢汹汹，索討欠賬，高聲喊說：「今天再不付房飯錢，就把你的行李扣留下來做抵押，從明天起，就請你走路，休想再住在我們這裡。」

正當老闆娘大發雌威的時候，住在宏信學旅的另外一位青年從外面回來，看見這位頭戴草帽的紳士住客被老闆娘所困，問明原因，立刻從衣袋裡取出五元，代他付了欠賬。老闆娘錢一到手，判若兩人，滿臉怒氣立刻變成笑容，歡天喜地走回賬房。戴徵蘭神態自然，揚長而去，走出店門，連一聲「謝謝」都沒有說。一直到晚上十點多鐘，他才去那位付錢朋友的房間道謝。戴徵蘭濃眉大眼，氣宇軒昂，那位朋友却是瘦弱矮小。從外表看來，這兩位青年極不相稱，可是慷慨豪爽的個性，不相上下。相談之下，才知道他是無錫人，名叫徐亮，字爲彬，也是來報考黃埔的。兩人談的非常投機，從此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。長堤廣泰來旅館住着另外一位從四川來的陝

西人，叫做王孔安，字敬宣，也是考黃埔的，成了戴、徐的朋友。

沒有幾天，都去長堤入伍生部參加考試，徐亮和王孔安考取了，戴微蘭却名落孫山。王孔安說：「你以前叫春風，現在又叫微蘭，不是你的運氣不好，恐怕是你的名字有問題，軍人那裡還有甚麼微蘭呢？花呀！草呀！改個名字吧！」徐亮、王孔安入伍，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二連。

黃埔軍校入伍生，一共有兩個團。編制是每團三營，每營四連，另外一個機關槍連。因為不是整批考試，陸陸續續，隨到隨考。凡是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，編為第五期入伍生，八月一日以後入伍的則為第六期入伍生。第二團的番號由第五期入伍生佔用，第六期祇留下第一團的番號，十二個連和機關槍連，編完後，第一團已經滿額。可是各地的青年，繼續不斷地湧到廣州，投考黃埔。尤其是北方青年，萬里迢迢，經過軍閥統制的地區，冒險南來，更不能拒絕報考。祇好把入伍生第一團擴大編制，增加了第四營，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四個連。一個營仍然容納不了眾多的投考者，很快第四營也滿額了；於是又增加了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三個直轄連。戴微蘭第二次報考，改名戴笠，字雨農，這一次考取了，編入第十七連，和勞建白、何亞雲等同連。九月以後，第五期升學，才把第二團的番號空出來，以後來的青年，編入第二團，一共有四千多人。第二團滿額以後，再來投考的青年編為學生軍，作為第七期入伍生預備班。

第六期入伍生部部長由教育長方鼎英中將兼任，入伍生第一團團長為郭大榮上校，第二團團長為李亞芬上校。

共產黨徒滲透黃埔

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元月二十二日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晉見國父孫中山先生，於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宣言：「咸認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。」國父才允許共產黨放棄他們的主張以後，個別加入國民黨，從事國民革命工作。殊不知共產黨本質就是「個很會偽裝，掛羊頭，賣狗肉，祇求目的，不擇手段，毫無信用，沒有道德觀念的強固組織，不會因為口頭上的承諾，就放棄他們的信仰和主張。他們加入國民黨的真正目的，並不是如宣言所說，改信三民主義，實行國民革命。而是利用國民黨做掩護，在國民黨裡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。」

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黃埔軍校成立，共產黨認定，這是發展共產黨武力的最好機會，讓國民黨來為共產黨培養軍事幹部，不是最合算，最便宜嗎？密令共產黨黨員盡量投考，進行滲透。所以，黃埔學生中間，混進了不少共產黨分子，第一期的徐象謙（向前）、第四期的林彪就是最著名的。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一月二十五日，共產黨分子發起組織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，作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，積極拉攏吸收非共產黨的同學參加，以擴大共產黨的聲勢與組織。教育長王柏齡很不滿意共產黨的跋扈行爲，加入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一部份同學發覺共產黨的陰謀，準備退出來

。王柏齡告訴他們：「退出青年軍人聯合會還不夠，你們應當組織一個團體和共產黨對抗，才能表明你們的態度。」

四月二十四日反共的黃埔同學如曾擴情、楊引之、陳紹平等在廣州成立了「孫文主義學會」，才有了對抗共產黨的組織，國民黨的同志不再是一盤散沙。在過去，因為共產黨分子跨了黨，明是國民黨，暗裏却是共產黨。國民黨開會，成了龍蛇混雜，良莠不齊，真假不辨。現在有了一「孫文主義學會」和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對立的組織，才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界線劃分清楚，壁壘分明，共產黨分子的狐狸尾巴既然暴露出來，國民黨的黨部才不再被他們把持。

這兩個組織開始在黃埔軍校衝突、鬭爭，連黨部開會，由辯論演變成廝打，文圖變成武鬭。開會要鬭爭，不開會談問題、談主義、談主張，各有各的立場，談不攏來，也要打鬭。打鬭不已，學校的軍風紀怎樣維持？於是蔣校長於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四月間下令解散了這兩個組織，另外成立了黃埔同學會。同學會係在校外的組織，在學校以內不起作用。

第六期入伍的時候，因為「孫文主義學會」不復存在，國民黨同志成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，無法團結。共產黨分子呢？「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」表面上解散了，而共產黨並沒有解散，他們運用黨團作用，暗中活動，指揮統一，步調一致。結果，共產黨對國民黨，成了有組織的一小撮對付無組織的一大羣。每次連黨部開會，都由共產黨操縱把持，國民黨同志被他們整的焦頭爛額

壓迫的拾不起頭來，一籌莫展。

還有政治部也控制在共產黨手中，由周恩來、熊雄先後任主任，政治教官幾乎都是共產黨分子，蕭楚女、鄧中夏、惲代英、施存統等都是能說善道的宣傳家，讓他們來訓練思想，公開散布邪說，曲解三民主義。意志不堅定，或者原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，分不開涇渭的同學，自然而然倒向共產黨一邊。而國民黨的各級黨部，在共產黨有計劃的操縱之下，執監委員都落在共產黨手裏，表面上是國民黨的黨部，背後却是一羣共產黨操縱着。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黨部，作為收拾國民黨同志的工具，真是一種可悲、可恥、可歎的怪現象。

戴笠入伍以後，黃埔軍校入伍生各連正是這種情況，他是一位忠貞的國民黨黨員，雖然厭惡共產黨分子所作所為，痛恨他們欺壓國民黨同志的那種囂張情形。但是他已經三十歲，閱歷經驗使他知道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怎樣明哲保身，怎樣忍耐。所以一直到清黨，共產黨都無法把他揪出來鬧垮。

那來的東山會議派

黃埔特別黨部的基層組織是連黨部，連黨部既然被共產黨所把持，所以各連連黨部會議，都由他們來操縱，成了他們曲解三民主義，宣傳三天政策，打擊國民黨同志的場合。他們說聯俄、容共、農工三大政策，是國父訂定的。所以，反對共產黨，就是反對三大政策；反對三天政策，就是反對國父的主張；反對國父的主張，就是反革

命。他們運用這種邏輯，整得國民黨同志出不上氣來，不敢對共產黨說半點不是。國民黨同志發言，如果不照着共產黨的論調說話，就說成反動派，反動言論。照着他們的論調說話，就大捧特捧，捧成最前進，最積極的革命青年，成了他們吸收為CY（共產主義青年團）的對象。

他們又製造了五項革命的帽子：右派、新右派、國家主義派、西山會議派、東山會議派。這五頂帽子，祇要給你隨便戴上一頂，就成了反革命分子，不被開除，也會被開禁閉。因為反對共產黨橫行霸道，反對共產黨曲解三民主義，第一團的同學四川謝靈石被戴上國家主義派的帽子，關了禁閉；湖南石仁成被戴上東山會議派的帽子，趕出黃埔軍校，開除了。

所謂「國家主義派」，就是指着曾琦、李璜、余家菊、左舜生、陳啓天等的青年黨。因為他們主張「外抗強權，內除國賊」，所以叫成國家主義派。青年黨反對共產黨，共產黨最恨他們，說他們是最反動的反革命派。所謂「西山會議派」，是指着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同志。國父逝世後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委員林森、張繼、鄒魯、謝持、居正等在北京西山碧雲寺。國父靈前商討怎樣對付共產黨，接着十二月二日召開一屆四中全會於北京，決議開除譚平山、李大釗、于樹德、林祖涵、毛澤東、韓麟符、于方舟、瞿秋白、張國燾等九個共產黨的國民黨黨籍，並宣言取消共產黨的國民黨黨籍。所以，共產黨痛恨他們，給他們取了「西山會議派」這個名字。至於「東山會議派」，則完全是共產黨杜撰的，根

本沒有這回事。

蔣校長知道共產黨在黃埔的潛在勢力不小，很不放心，分別派遣第二期同學陳超和胡靖安回廣州，秘密聯絡國民黨的同學。胡靖安回到廣州，一方面秘密聯絡同學，一方面和第三期同學周復，被開除的高級班四期同學葉維，六期入伍生被開除的石仁成創辦「三民週刊」，從理論上、宣傳上和共產黨鬭爭。

陳超住在廣州東山，工作很積極，聯絡了不少同學，同學們常常去東山看他，被共產黨知道了。他們怕陳超把國民黨的同學組織起來，成為有力量反共團體，乃先發制人，杜撰了「東山會議派」這個名詞，說陳超召開東山會議，把無說成有，把假說成真，大事宣傳。他們說東山會議派是和西山會議派一脈相承的反革命集團，又說西山會議派那些反革命者的名字都是兩個字的單名，所以東山會議派的頭子陳超也是兩個字。這種宣傳，幼稚得可笑，但是效力很大。同學們怕戴上「東山會議派」的反革命帽子，被開禁閉，被開除，自然不敢和陳超接近，陳超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阻攔。共產黨所杜撰的「東山會議派」這個無聊的名詞，在社會上，在國民黨裏，也許不會有太多的人知道。可是當年在黃埔的第六期同學，對於這個名詞，却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。

戴笠在十七連，年齡最大，能力又最強，可是在共產黨的氣氛籠罩之下，祇好裝成老朽昏庸。他早和陳超發生關係，也和胡靖安他們有聯絡。十七連的共產黨背後宣傳戴笠是東山會議派，

說他處處裝蒜，是個偽裝的反革命分子。但是連黨部開會，他從來不說一句話，共產黨抓不住他的把柄，奈何不了他，一直到清黨，都不能整垮他。

在騎兵營鋒芒漸露

十五年十月十日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昌，生擒守城的敵將劉玉春和陳嘉謨，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分批從廣州遷往武昌。十二月十五日徐謙等成立中央臨時聯席會議，徐謙為主席，實際被俄顧問鮑羅廷和共產黨所操縱，開始進行反對蔣總司令的活動，造成社會動亂，充滿殺機，軍校第二期同學楊引之等被殺害，楊引之為前孫文主義學會的中堅分子，為共產黨所痛恨。

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徐謙、鄧演達公開攻擊蔣總司令，黃埔軍校的共產黨也隨聲附和，明目張膽，批評校長。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，二十三日江右軍克復南京。四月一日汪兆銘（精衛）經莫斯科回到上海，五日以國民黨領袖自居，私自和共產黨的陳濁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，允許和共產黨共治中國。又不聽同志們勸阻，於九日悄悄抵達武漢，成為共產黨的傀儡。十二日南京方面實行全面清黨，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因此寧漢分裂。

廣州於十四日開始清黨，黃埔軍校因為教育長方鼎英礙於私情，未能執行黨的決策，放走政治部主任賴雄，教官蕭楚女、廖划平等和學生中的共產黨分子。第六期同學聽到清黨的消息，都自動起來清黨，但是共產黨分子得到消息，早一

天都逃跑了。平時發言帶有共產黨論調的同學，都被看管，成了代罪的羔羊。十七連由戴笠策劃，也進行了清黨。

校長蔣公鑑於在北方平原作戰，需要騎兵，命令黃埔軍校就第六期入伍生挑選三百人，成立騎兵營，以沈振亞為營長。戴笠對騎兵很感興趣，於是參加騎兵營，編入第一連。他才華畢露，成了騎兵營最活躍、最具領導才能的傑出人物。不久黃埔特別黨部的各級黨部改選，戴笠當選為騎兵營黨部執行委員。

清黨以後，政治部的共產黨分子逃的逃，藏的藏，幾乎成了真空，才由國民黨同志來接管，校本部政治部主任為鄧文儀；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為胡靖安，秘書周復，宣傳科長葉維。後來因為入伍生部政治部發行的「入伍生」周刊上刊登了喬家才的一篇「給方教育長的一封信」，問他清黨以前，為甚麼幫共產黨壓迫國民黨同志？清黨時為甚麼放走共產黨分子？方教育長一怒之下，把上校主任胡靖安，少校宣傳科長葉維和上等兵入伍生喬家才三個人告到總司令部，參謀總長李濟深通知胡、葉，要他們離開廣州，然後批示禁閉喬家才兩星期。入伍生政治主任改由曾濟寬接任，童秀明任秘書。

這一年秋天，騎兵營奉命開到蘇州，正趕上校長蔣公為促成寧漢合作，於八月十三日辭去本兼各職，回到奉化。戴笠和劉藝舟、顧雲章代表騎兵營同學，赴奉化晉謁校長。戴笠氣度軒昂，口齒清利，講話扼要而有力。校長蔣公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對他們慰勉有加，要他們回去好

好讀書。因為校長下野，騎兵營在蘇州無人照顧，連吃飯的買菜錢都沒有着落。沈營長的太太變賣首飾來維持他們的伙食。好些同學不忍心再留在騎兵營吃飯，各自去謀生，戴笠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胡靖安離粵抵京後，組織偵查組，組員有王兆槐、東方白、廖五郎和戴笠。寧漢合作結果，於九月十六日在南京成立了特別委員會，二十八日校長蔣公從上海出發，前往日本。胡靖安留在上海一方面聯絡同學，一方面繼續偵查組的工作，蒐集情報，報告校長。後來王兆槐調總司令部上尉參謀，廖五郎和東方白也他去。上海祇留下戴笠一個人，協助胡靖安工作，既沒有名義，也沒有待遇，但是他幹得非常起勁，毫不鬆懈。

總司令部聯絡參謀

十六年十月十日校長蔣公從日本回到上海，住在拉都路二十號，胡靖安因為過去工作很有成績，任侍從副官。每天晚上，必須把當天的情況報告校長，幫助他做這工作的，都是義務。內勤由蔡勤軍負責，情報來源，除戴笠供給以外，由擔任警衛上海的兩位團長，閩北張本清團長和南市的另外一位團長供給。

南京成立了特別委員會，却把汪兆銘一脚踢開。他所以願意寧漢合作，是想分一杯羹，佔一席地位，現在落了空，當然不甘心，於是回到廣州，又開始了反特別委員會的活動。他可以依靠的武力，是張發奎的部隊，張的部隊從武漢開回廣東。清黨時第六期入伍生逃走的共產黨，逃到

武漢，都加入張發奎的部隊，現在都跟着回到廣州，對黃埔造成很大的威脅。汪兆銘也從上海回到廣州，進行反對特別委員會的活動。

二屆四中全會打算在上海召開預備會議，十一月十六日汪兆銘偕李濟琛離粵赴滬，出席會議。第二天清早，張發奎和黃琪翔、朱暉日在廣州發動「張黃事變」，繳了李濟琛衛士和部隊的槍，佔領了黃埔，第六期同學大部分逃離廣東，到了上海。因張黃事變，引狼入室，終於導致了十二月十一日的共產黨廣州大暴動，燒了半條最繁華的永漢馬路，殺了不少的人。後來經第五軍李福林和薛岳的部隊把共產黨趕走，才恢復了廣州的秩序。

十二月十日二屆四中全會第四次預備會議，通過蔣校長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案。十七年一月四日，蔣總司令復職，繼續北伐。胡靖安不再擔任侍從副官，由他主持的情報工作改由戴笠負責，名義是聯絡參謀，南京方面的情報工作，則由蔡勁軍負責。

不知道甚麼緣故，總司令的侍衛長王世和看見戴笠很不順眼，不但阻止他晉見總司令，連報告也不給他轉呈，並且告訴他，如再有所要求，就把他趕了出去。但是戴笠有很重要的報告，又不能不呈送總司令。他那百折不回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，絕不會被王世和所折服的。他調查清楚總司令將要到某一個地方，預先藏在汽車的附近，等到總司令一下汽車，跑步過去，呈上報告。這麼一來，王世和對他更氣更恨了，認定他有意搗亂，祇要捉住他，非結實揍他一頓不可。

可是總司令看過戴笠的報告，不等他請求晉謁，總司令自動召見他。王世和雖然氣上加氣，却無可奈何，不但再不能阻撓他晉謁總司令，還得派人去請他。戴笠成了總司令部的上尉參謀，重要的情報人員。

情報工作本來是一種花錢的工作，但是戴笠除了薪餉，再沒有別的费用。他出門總是帶着勤務買金南，携帶着最簡單的行李和一隻行軍床，那是預備隨處露天打地鋪用的。十七年第二次北伐，克復徐州，衛立煌任徐州戒嚴司令，徐州是軍事重鎮，交通樞紐，戴笠必須在徐州有個落脚的地方，他又沒有錢住旅館。幸好老朋友王兆槐幫忙，才給他介紹一家小印刷廠，做了他的徐州行館。到了四月間，總司令委派他為徐州戒嚴司令部的少校參謀，才有了辦公處所。錢不夠花，向家裡要。藍太夫人省吃儉用，也要支援他，每月從江山匯錢給他，讓他放手去工作，不因缺錢稍受影響。

第二次北伐，戴笠奔波於津浦、隴海線上，在河南山東地區，日夜工作着，對於敵我情況，做了確實的報告，幫助了軍事迅速進展。他的情報長才，表現的非常優異，得到總司令的充分了解和信任。他在碭山遇到徐亮，在徐州遇到鄧展謨，都成了他的臨時助手，幫助他工作。鄧展謨係軍校第五期同學，原在第六軍程潛的部隊裡工作，後來聽到程潛公開詆毀總司令，認定程潛不忠於革命，沒有前途，一氣之下，不幹了。他幫助戴笠工作了一段時間，戴介紹他到胡宗南那裡，做了連長。

十萬元捉拿江漢清

十七年六月四日張作霖向關外撤退，被日本關東軍炸死於皇姑屯。八日第三集團軍商震的部隊進入北京，北伐完成。十七日張學良化裝成士兵，秘密回到奉天，接管東北，才不為日本軍閥所逼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張學良、張作相、萬福麟通電，宣佈東北四省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服從國民政府，實行三民主義，全國統一。

北伐軍克復北京後，姜超嶽是總司令部前方機要科長，住在北平。按照總司令部的規定，由機要科代發密電，必須附有原稿。一天，戴笠找姜超嶽，請他代發幾封電報，姜超嶽說：「按照總司令部的規定，一定要附原稿。」

「那就不用了。」戴笠說完，密電沒有讓他拍發。沒有過幾天，姜超嶽接到秘書長高凌波的電報：「奉總座諭，以後戴笠拍發電報，不必按照規定辦理。」姜超嶽心裡才明白，戴笠神通廣大，一定是他報告總司令，才有這個通知，但是戴笠以後再也沒有找姜超嶽拍發過電報。

中央政府為節省浩繁的軍費開支，從事國家建設；另一方面想打破過去軍閥割據局面，要求軍隊屬於國家，建立現代化的國防軍，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。十八年元月一日，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。想不到手握重兵的那班人，並沒有拋棄軍閥思想，都要擁兵自重，不管國家不國家，不願意削減自己的部隊，先後叛變，使剛剛統一的局面又歸破裂。先是桂系李宗仁在兩湖異動，最後退回廣西。接着馮玉祥在豫陝叛變，自稱護黨

救國西北軍，中央下令討伐，以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為討馮前敵總指揮。又因張發奎和李宗仁進攻廣東，調石友三部援粵，實則石與馮玉祥、唐生智早有勾結，陰謀劫持統帥，事洩，於十二月二日在浦口叛變，自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。五日唐生智在鄭州叛變，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，和石友三互相呼應。

這時候，戴笠正在潼關，化名江漢清，以軍事雜誌社記者身份，從事秘密活動。他知道唐生智叛變的消息，返回河南，偵察唐部情形，同時也想進行策反，瓦解唐生智的力量。他和信陽一位小學校的李校長，因為見解相同，主張一致，成為好朋友，李校長不但幫助他探聽消息，調查情況，並且還介紹了漯河、駐馬店和許昌的朋友幫助他。這一天，戴笠來到李校長家裡。「唐生智下令捉拿江漢清，你不知道不知道？」李校長見他大搖大擺地走來，很吃驚地問他。

「不知道，你怎麼知道？」戴笠反問他一聲。

「我在泰安旅館親眼看到軍警盤查住客，他們還拿着你的像片，捉拿江漢清，我真為你擔心。聽說唐生智出十萬現大洋買你的人頭，你不能不小心呀！」

戴笠渾身是膽，硬是不怕危險，他不但聽李校長的勸告，住在李家，避一避風頭。反而化裝成北平清華大學的學生模樣，脫去中山裝，改穿長衫，戴上眼睛，平時頭髮向後梳，現在改成分頭。晚上住進軍警稽查處緊隔壁的佛照樓大旅社，實地觀察情況。他這樣簡單一化裝，居然瞞

過軍警。他已經調查清楚，軍警稽查處處長周偉龍，字道三，湖南人，軍校第四期同學，唐生智的特務營營長，是一位敢作敢為的角色。他衡量輕重，自己未必能够逃出信陽，不如採取攻勢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冒險去策反周偉龍。

「我就是戴笠，也叫江漢清。」第二天早晨，戴笠拿着東方白的名片，去見周偉龍，這樣自我介紹。周偉龍看見自己要捉拿的人，居然敢自己送上門來，詫異得不敢相信。

「聽說唐孟瀟出十萬現大洋買我的這個腦袋，」戴笠用右手拍了拍他自己的腦袋，說道：「既然這顆腦袋值十萬元，就不能讓別人拿去，我仔細考慮，還是送給自己同學好。我們的校訓不是親愛精誠嗎？現在你不但有了十萬現大洋，說不定還會升官呢！」

這種大膽的作風，可真把周偉龍唬住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不知該怎樣處理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，戴笠是這樣視死如歸，豪爽痛快的角色，內心裡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戴笠看清楚周偉龍的精神已經被他征服，於是侃侃而談：「一位堂堂正正的革命黃埔學生，不應該跟一個反覆無常，一再背叛國家的無知悍將來賣命。唐生智不會有前途的，他的力量也不是中央的對手，支撐不了好久。」接着問道：「一旦唐孟瀟失敗了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周偉龍既被戴笠的大無畏精神，誠懇態度，慷慨銳利的言詞所懾服。表示願意效忠中央，效忠校長，接受他的計劃，進行策反唐部，使戰事早日結束。當天上午，周偉龍親自把戴笠送上南

下的火車，安全離開信陽，周偉龍遵照戴笠的指示，策反唐部已有成效，然後去漯河車站找整編第一師第一旅的鄧展謨聯絡，要見旅長胡宗南，報告策反情形。因胡宗南不在，鄧展謨趕緊引見副師長兼第二旅旅長徐庭瑤，這樣裡應外合，沒有幾天，唐生智的叛變也就結束了。

民族復興運動崛起

繼民國十八年的全年動亂後，十九年閻伯川先生和馮玉祥聯合對抗中央，發生中原大戰，造成更大的動亂。先是十九年二月十日閻先生電蔣主席，高唱禮讓為國，要求共同下野，十四日蔣主席發表談話：「目前正吾人努力奮鬥之日，決非高蹈遠引之時。」

二十三日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等四十五人發表通電，提出黨統問題，汪兆銘在廣東通電響應，一唱一和，促成中原大戰，雙方都打得筋疲力竭。訓練不久的國防軍教導第一師，也不得不投入戰場，犧牲慘重。

在政治方面，配合閻馮的軍事行動，汪兆銘在北平召開以改組派為基礎的擴大會議。一直到九月二十二日張學良的東北軍開進關內，接掌北平，十月三十一日閻馮下野，前後經過半年以上，消耗國力很大。戰爭期間，戴笠僕僕風塵，蒐集情報，不遺餘力，蔣總司令對他更為器重。他為偵察擴大會議，曾派王孔安加入反中央組織，到達北平參加會議，瞭解擴大會議的一切活動。王孔安又介紹李丹符給戴笠，派去策反鄧寶珊；柯玉珊去策反馮玉祥部趙冠英，都發生了相當效

力。

十九年中原大戰，又和第二年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有着因果關係。如果東北軍不因中原大戰，開進關內，東北成了真空，則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侵略戰爭，張學良為求自己生存，也不能不起而抵抗，日本軍閥就不會討到不抵抗佔領東北四省的便宜。因為不抵抗喪失國土，全國輿論大譁，各地學生紛紛赴京請願，給共產黨造成可乘機會，滲透了學生組織，操縱了請願活動。他們攻打外交部，攻打中央黨部，外交部長王正廷，中央委員蔡元培都被打傷。蔣總司令也於十二月十五日引咎辭了國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院長、海陸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，返回奉化故鄉。

這時候一部分黃埔同學為了救亡圖存，醞釀救國運動，策劃抵抗侵略。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蔣公入京，共赴國難。二十八日日本軍閥又發動淞滬戰爭，三月六日淞滬停戰，九日東北傀儡組織偽「滿洲國」成立。十八日蔣公就任改組後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。

委員長召見救亡運動的黃埔同學，聽取他們的救國意見。他們主張對日作戰，否則人心一去，則內奸蜂起，外敵乘之，日本軍閥、中國漢奸、共產黨都可以制我們的死命。

委員長告訴他們：「那個不願意做民族英雄，而甘受人咒罵？我能指揮數十萬軍隊，如不負責任，孤注一擲，我不能做民族英雄嗎？但我既確知彼知己，斷不能為個人，而犧牲國家人民部屬。只有逆來順受，忍辱負重，以求無愧。從現在起，為保衛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，為貫徹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大業，必須負起責任，爭取一分一秒的時間，腳踏實地，實幹、硬幹、苦幹、快幹。須知多一分準備，便少一分犧牲；多準備一天，便少一天危險。我們斷不能不負責任，掉以輕心。將總理與諸先烈艱苦得來的革命成果，孤注一擲而斷送了。」

於是桂永清、賀衷寒、蕭贊育、胡宗南、曾擴情、潘佑強、鄧悌、杜心如、鄧文儀、孫常鈞、蔡勁軍、葛武榮、鄭介民、周復、邱開基、康澤、李一民、駱德榮、黃仲翔、韓文煥、滕傑、

葉維、婁紹鎧、彭孟緝、易德明、于國助、戴笠、劉誠之等二十八人開始了民族復興運動，協助委員長整頓軍隊，組訓民衆，改革風氣，嚴肅紀律，提倡新生活運動，準備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切工作。這個運動做得得聲有色，蓬蓬勃勃，風氣轉變，人心振奮，收到極大的成效。許多留學生如倪文亞，文人如劉健羣、王受泰等也都參加了這項運動，造成一種新氣象，使人人個個都有了新希望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抗戰時期，戴雨農（笠）先生席不暇煖，奔走各地，在敵後的窮山惡嶺間，也有他的蹤跡。